

警惕：城市化的“陷阱”！

■ 宋养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

目前在我国，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化的发展快得惊人：一天一个样，三天大变样！我到过许多经济发达的国家，还没见到一个国家有那么多的大城市、特大城市。古往今来，大城市都是人工建造的庞大物体。如今，当人们把大量的钢筋、混凝土无限地注入大城市时，便注定了它不可能使之像自然物——如水、空气和阳光那样进行自我循环，也无法通过自身的呼吸来吐故纳新。比如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，常住人口已经超过 2000 万，城很大，楼很高，人们长期生活和工作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。随着城市的发展，土地和空间更是越来越小。例如，我居住的地方，楼宇之间本来有小块绿地，渐渐地变成了停车场，那片如毡的草坪，早被橡胶的车轮磨得精光！上海、天津、重庆、深圳、广州更是如此。大城市的快速发展，从一定层面讲，是一件好事，它可以扩大内需，增加就业，但绝不是越大越好，越多越好。《红楼梦》中说：“大有大的难处”！

城市学告诉我们，许多国家的实践证实，城市的发展，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，要有一定的限度，绝不是越大越好，越多越好。人类是对自然界极具破坏力的物种，大城市的无度扩张，对自然界的破坏是难以估量的。同时，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，因其运作的复杂性和脆弱性，常常因为管理不善、技术失灵、操作失误、人为破坏等原因，很容易导致灾难性的后果。这就是西方所说的“墨菲法则效应”。

著名科学家普利高津曾说过：城市就整体而言是一种耗散结构，它需要从外界输入各种各样食品、燃料和原材料，同时也不断地输出大量的“废物”。城市输出的“废物”是城市难以避免的污染源头。城市污染包括：固体废物污染(内含各种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、废旧电子产品垃圾等)、大气污染、阳光污染、水污染、声光、电磁污染等。有的大城市周围，涌现出一座座的“垃圾山”，这些“垃圾山”，天天在扩展，逐步把城市包围起来，并持续不断地散发出大量有毒气体。在城市的污染中，水的污染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话题。据了解，中国多数城市里的水质，让人生疑！

所有这些污染，如同无数把“利剑”，高悬在城市的上空、渗透在城市的中间、密布在城市的周边、交相作用，持续不断，给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，带来莫大地有形和无形的威胁，导致生存和生命的灾难性后果。例如，今年上半年中国诸多城市出现的雾霾天气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大气严重污染种下的恶果。再如，因为污染，导致许多新的传染病及其病种滋生，而且很容易蔓延，蔓延开来又难以控制。又如，城市车多，除了由于车辆不断散发的尾气污染城市空气外，因堵车而发生的车祸，更是屡见不鲜，屡戒不止——每年因车祸而死亡的人数以数十万计。再如，近些年来，许多城市因排水不畅、大雨成灾，城市变成“泽国”，殃及黎民百姓。还有，一旦发生地震，连逃生的地方都难找。

当前，正是我国城市建设的高发期，很多地



大城市的快速发展，从一定层面讲，是一件好事，它可以扩大内需，增加就业，但绝不是越大越好，越多越好。《红楼梦》中说：“大有大的难处”！

方紧锣密鼓地大搞城市化运动，如：改造老城市，开发新城区；大城市纷纷提出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口号和目标。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，随着城市建设和更新的大规模推进，中国先后就有 180 多个大城市提出“建设国际化大都市”的计划；中等城市大踏步向大城市迈进；小城市不断扩充领地，加大投入，向中等城市进发；许许多多不起眼的小集镇，也在不惜工本，不计后果，大兴土木，毁坏大片农田、林木，大搞小城镇建设。放眼全国，的确呈现出一片轰轰烈烈城市化的架势。有些地方，似乎拿出 1958 年“大跃进”的劲头，开疆辟土，大搞城市化的建设。

更值得关注的是，我国西北地区，生态环境脆弱、经济底子差、人口稀少，但有些城市，凭借眼弱的自然资源优势，在老城周围，肆意扩建新城，无限制地扩大城市面积；新城的雏形虽然有了，可是，新城区因造价高昂，房价居高不下，再加基础设施不完善，缺这少那，就业机会有限，导

致进住的人迹稀少，新城寂静一片，犹如“荒城”。据官方公布的数据：“过去十年，中国总共消失了 90 万个自然村”，“比较妥当的说法是每天消失 80 至 100 个村落”。“传统村落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，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。”

有人不恰当地提出，城市化的要害是“人口城市化”。农村人口大量进城，随之产生两方面问题：一方面，进城的大量人口，在城市发展难以容纳那么多人口的情况下，找不到就业岗位，没有工资，买不起住房，生活难以为继，容易惹是生非，成为城市不安定的因素；另一方面，农民进城，主要是青壮劳动力进城，农村剩下的大多是老弱病残，农田谁来耕种，庄稼谁来收割？

中国是一个人均土地资源比较短缺的国家，建设大、中、小城市，必然要挤占大量的土地，包括农民的耕地、住地，排挤农民的就业，减少粮食的生产面积。民以食为天，我们是 13 亿人口的大国，一人一张嘴，天天要吃饭。面对这样一个大问题，值得当局及全国人民认真对待。

中国的城市建设还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，就是城市文化模式大致雷同，其中包括城市的规划设计、市容市貌、乃至产业结构都出现同质化趋势，形成了“千城一面”的模样。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城市建设之大忌。

城市原本是一个地区富强、繁荣、文明的象征，如果不适当地无序和无效地建设，其后患无穷。城市也如同一台复杂、庞大的机器，要让这台机器正常运转起来，不能光靠拍脑袋仓促行事，一定要深思熟虑，谨慎从事。

当代我国的城市建设，一定要充分发挥各自的地理优势，突出特点，继承和发扬历史的文化传统，坚持时代精神，真正建设成各具特色的城市。比如，英国小城牛津，这座城不到 10 万人，也许在中国人的眼里，可能算不上是一座城市，但由于牛津大学的存在，而闻名天下。牛津市是学术和科学的殿堂，整座城市时时刻刻都处于浓郁的求知氛围之中。

西方，有一种热门科学，叫“田园经济学”，又叫“田园资本主义”，主要讲的是大城市的弊端，城市中的富有阶层，纷纷外逃，落居郊外。

应当承认，目前在我国，小城镇的发展比较落后，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。为了推动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，缩小城乡二元结构，全面实现现代化，有条件地让农民逐步而又有序地融入城市，扩大就业，增加内需，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，改善他们的生活，改革社会面貌，加快建设小城镇是十分必要的。但必须提高小城镇建设的质量，要因势利导，趋利避害，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的全过程之中，走集约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、低碳化的新型道路。切勿贪大求全，要讲求小而精，坚决防止把城镇化变成城市扩展型的大城市化，防止人为造市，大造城市，造大城市，搞空城化。

建设“美丽中国”的号角已经吹响，只有科学地建城，把城市真正建设成天蓝、地绿、水净之时，城市才会真正成为我们美好的家园。

改革不停步 发展再扬帆

■ 邹东涛 欧阳日辉

(上接 6 月 8 日 03 版)
六、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

中共十六大以来，我们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，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，经济平稳较快发展，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，经济建设取得一系列新的历史性成就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。这是一个让世界惊叹的“黄金十年”。

统计数据显示，2003-2011 年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 10.7%，其中有六年实现了 10% 以上的增长速度，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 2009 年依然实现了 9.2% 的增速。这一时期的年均增速不仅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 3.9% 的年均增速，而且高于改革开放以来 9.9% 的年均增速。经济总量连续跨越新台阶。2011 年，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47.2 万亿元，扣除价格因素，比 2002 年增长 1.5 倍，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。2008 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德国，居世界第三位；2010 年超过日本，居世界第二位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 2002 年的 4.4% 提高到 2011 年的 10% 左右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20%。

小小寰球，无奇不有，无怪不存。具有五千年发展历史的古老文明中国，却往往被一些只有一二百年国龄的某些人成天谩骂。在一百多年前，别人瞧不起而既欺侮又谩骂中国，那是因为中国衰落了，沦为东亚病夫，而今日中国繁荣昌盛，位居世界第二经济强国，则有那么一些人，主要是美国人，一方面谩骂中国，另一方面又竭力聒噪唱衰中国。

其实，美国人也好，其他外国人也好，他们实际上根本上离不开中国，因为如果没有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支持，即没有中国订单和贸易的支撑，他们的经济更会加速衰落，甚至破产。

过去 20 多年，对于中国经济的来，国外媒体出现各种花样的“唱衰论”，聒噪不止。无论是“唱淡中国”，还是“做空中国”，在中国快速发展的现实面前，这些唱衰论、聒噪论不改而自垮，成为过耳噪音。美国专家罗伯特·库恩说：“2002 年到 2012 年是一个发展、巩固和变迁的历史阶段。中国在胡锦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成就，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这种令人惊叹的经济增长和持续的稳定局面，使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得到印证。”

在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尤其是 2008 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，包括单边主义强美国也受到严重冲击，而中国却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。两次危机的风暴，不仅啃不动中国，吹不倒中国，而且中国以“兼济天下”的博大胸怀和人文情怀，成为抵御和治理世界经济和金融危机的中流砥柱。这就使得世界各国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。

什么是“道路”，什么是“模式”？二者既相通，又相异。相通是指意义有替代；相异即差别和不同。我们的理解是，“道路”是“模式”的基础和前提，“模式”则是“道路”的具体表现形式。如果说“道路”属于“主义”层面东西，“模式”则属于形式和方法层面的东西。“中国道路”，就是指中国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。

中国道路是中国当代历史发展的过程。第一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，是“中国道路”的奠基礼。“社会主义”是新中国、新道路的起点。新中国走过许多弯路，受过许多挫折，但总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探索。改革开放则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持续而成功的新探索。第二，反思苏联模式形成和探索中国发展的道路。中国坚决不走苏联、东欧那种“休克式”、“激进式”的改革道路，而坚持走中国特色的“渐进式”改革道路。第三，“60 年改革”探索中国道路。新中国的前 30 年已经进行过 4 次经济管理体制改革，与后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一起，共同探索着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。第四，学习、选择、借鉴、消化、吸收国外先进的经验，不断地促进着中国国外发展，同时对中国道路的完善和优化也起着积极

的补充作用。第五，“渐进式改革”成就了中国道路。为了使改革易于进行，尽量不搞体制“存量改革”，而搞体制“增量改革”。第六，“逼迫机制”促进中国道路完善。严峻的形势必将内部制度改革形成“逼迫”，进而从根本上形成利于内需启动的社会和经济环境。善用“逼迫机制”的激发效应，将改革开放不断推进深入。

“中国模式”是中国改革开放迄今成功经验的理论凝结。中国模式有四大理论支柱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，科学发展观理论。中国模式能够成功，在于：中国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以及在这个党领导下的强有力的政府，尤其是一个富有权威的中央领导，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成功的重要政治前提；经济改革“理性超前(激进)”和政治改革“理性滞后(保守)”的非对称组合；坚定不移地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，但又高度警惕和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；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，但又坚决不搞教条主义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，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文明传统，同时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。

中国道路的成功案例引起了国外的热烈讨论。俄罗斯《红星报》指出：中共的“中国道路”“没有盲目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”，所以“谱写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国家成就华章”。中共“提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—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，而苏联由于没有进行这样的改革而解体”。奈斯比特、米歇尔·戈德等人也认为，中共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“体现了时代的话题”，“正在改变全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看法”。

攻击和否认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聒噪之声最强的美国，却有这样一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罗伯特·库恩，他总是长期坚定不移地客观介绍和评论中国：“中国共产党正在创造历史。在历史长河中，今天的中国可能是一个经典案例。这个案例讲述的是一个国家在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体制下，怎样去建设一个繁荣、民主的社会。”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说：“中国共产党在过去 60 年里表现得相当不错，并证明了它的合法性。中国没有错误地保护了它的国家利益，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；改善了人民的生活；发展了国家经济；甚至改善了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。”

历尽天华成此景，人间万事出艰辛。改革开放 34 年后的中国，已然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停倒退没有出路。十八大总结了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，也描绘了未来发展的新目标，这标志着中国又迈向了改革发展之路的新征程。沿着中国模式，中国让世人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，以及领路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志向和逻辑。沿着中国道路，中华民族已经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，中国人民的生活已经达到了小康，还将建成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。

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了，中国经济的未来不仅中国人关心，外国人一样高度关注。国外经济学家也已经把中国作为全球市场走向的风向标。有国外媒体指出，在接下来的 10 年中，从美国到奈米比亚，各国的战略和政治决策将无一不受到中国的影响。德国《镜报》周刊网站发表题为《中国正位于从世界工厂走向工业强国的十字路口》的长篇报道，中国“向何处去”对德国乃至全球企业至关重要。

2012 年 10 月 20 日，当十八大刚刚闭幕，英国《泰晤士报》就报道说：这个国家领导层将管理全球人口最多，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、军事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。有一点可以确定，那就是这一领导集体不仅影响中国，也将影响着全世界。十八大已经把进行了 34 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！

十八大把中国小康社会的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！十八大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！

热 视 角

中国正绘制土壤重金属“人类污染图”

记者近日从国土资源部、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，我国正建立涵盖 81 个化学指标(含 78 种元素)的地球化学基准网：以 1:20 万幅幅为基准网格单元，每一个网格都布设采样点位，每个点位都采集一个深层土壤样品和一个表层土壤样品。深层样品来自 1 米以下，基本代表未受人类污染的自然界地球化学背景；表层样品来自地表 25 厘米以内，是自然地质背景与人类活动污染的叠加。用表层含量减去深层含量，即得出重金属元素“人类污染图”。

“鱼米之乡”面临难以承受之重

刘湘骥是攸县大同桥镇大板米厂老板。自从今年 3 月厂里的检测出镉超标以来，刘湘骥几乎每晚都辗转难眠。双眼布满血丝的他 2 个月内体重骤减了 20 多斤。“镉是什么东西，我都不知道。”刘湘骥说，他的大米厂从收割、脱壳、碾米、抛光到包装所有程序都是物理性操作，不存在添加或产生镉等重金属污染的可能，污染只能来自于生产大米的农田。

像刘湘骥一样深受“镉米危机”之害的人不在少数。更多业内专家认为，这是一场迟早要来的危机。

湖南省地质研究所专家童潜明认为，我国土壤污染形势已十分严峻。中国水稻研究所与农业部粮食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2010 年发布的《我国稻米质量安全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》称，我国 1/5 耕地受重金属污染，其中镉污染的耕地涉及 11 个省 25 个地区。南方省份土壤中重金属本来底值就偏高，加之多年来经济结构偏重于重化工业，大量工业“三废”排放加剧了土壤重金属污染形成。

“掠夺式”开发加剧土壤污染

童潜明认为，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成因十分复杂，有工业造成的污染，也有农业投入品滥用造成的污染。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首先来自于工业“三废”。对土地的“掠夺式”开发加剧了重金属进入土壤的步伐。

湖南省权威部门统计显示，由于不合理耕



近日抽检数据“镉米再现”消息不胫而走，公众哗然。土生万物，清除“镉米”背后的土壤污染，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全面会诊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，绘制土壤重金属“人类污染图”。

作、过度种植、农用化学品的大量投入，与上世纪 80 年代第二次土壤普查时比较，目前湖南省耕地土壤 pH 值已由 6.5 下降到 6.0，30 年土壤酸化程度相当于自然状态下 300 年的酸化程度。

湖南省一位农业专家说，土壤酸化带来的直接影响，是增加重金属在土壤中的活性使其更容易被作物吸收，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重金属污染的危害。

治理土壤污染“危”中有“机”

“土壤污染的治理与恢复是一个长期过程。”湖南省一位土肥专家说，通过相关农艺手段如增加土壤有机质、施用含硅土壤调理剂、采用生物吸收法等能够钝化、减轻甚至修复多国家的超标土壤。他希望这次“镉米危机”能够引起国家和湖南省对耕地质量的足够重视，设立专项资金对酸化土壤进行修复改良。

湖南泰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土壤修复业务的企业，公司董事长曹典军认为，“完全不可逆的污染耕地毕竟只占很少一部分，大面积来说，我国的土壤污染还是能够得到修复的。”曹典军说，目前我国并不缺乏治理土壤污染的技术和人才，缺的是政策、资金的支持和社会进一步关注。

“在经历了镉米危机之后，治理土壤污染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已更加凸显。”湖南省环保厅副厅长谢立说，目前湖南省针对全省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，环保、国土、农业等部门已在联合开展抽样调查。相信根治土壤污染并非遥远的梦。

(大洋日报)